



正确认识和把握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

□ 孙 颖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就共同富裕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要求“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明确“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要推动先富带后富、帮后富”，指出“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高瞻远瞩地指明了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路径，开创性地回答了“为什么要推动共同富裕、什么是共同富裕、怎样推动共同富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当前我们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共同富裕是一个赋能提升的过程，要发挥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作用，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本质属性和鲜明特征，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梦想和追求。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奋斗目标，并在历史接续中不断推动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全面学习苏联模式，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把握不透，简单把“一大二公”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表现，以低收入水平下的平均主义来实现低层次的“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把共同富裕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高度，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新的历史方位，作出了一系列关于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科学部署，强调“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在百年光辉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伟大的发展奇迹。这离不开我们党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紧紧围绕“生产力是社会发

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一科学论断，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离不开我们党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照搬照抄、不迷信盲从，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共同富裕是随着生产力高度发展形成的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富裕、共享发展成果的状态。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一主线，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是有效整合资本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带动各类生产要素聚集配置的重要纽带作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资本可以依托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造福全体人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实现共同富裕。同时，也要看到，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既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又会在无序扩张、违规扩张中给社会经济带来危害。我们要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在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抑制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正确处理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区分，在定位上明确，规范和引导各类资本健康发展。以更新思路、更实举措确保资本为我所用，突出正向引导，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增加有效金融服务供给，加强反向约束，及时化解金融风险。在民生和公共服务领域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力量，探索形成增进民生福祉、提升治理效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多方共赢新路径。

近年来，我国一些领域出现资本无序扩张、肆意操纵、牟取暴利等现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必须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同时，也要认识到，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不是不要资本，而是要资本有序发展。资本有发展的冲动，同时也有创新的力量。不能简单把市场中出现的问题，片面认为是资本发展带来的结果，更不能将其归结为所有制的问题，关键是要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

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渐进的过程，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勇毅笃行久久为功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要分阶段扎实推进共

同富裕。当前，我国既面临收入差距过大、劳动份额占比较低等老问题，又面临技术进步和人口老龄化可能对收入分配造成影响的新挑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得到解决。面对种种困难与挑战，我们需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艰苦奋斗。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课题，在不同发展阶段富裕的标准也会变化，要用大历史观看待共同富裕，始终保持科学态度，坚决避免落入“平均主义”“速成论”以及超出能力的“福利主义”等误区。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让社会收入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围内，让每个人都能从发展中获益，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旗帜鲜明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始终坚持以发展惠民生。优先发展教育事业，通过高质量的教育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并注重资源优化配置，办好优质均衡、有温度的教育，实现教育公平，增进社会公平。我国有十几亿人口，在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上实现全方位、各阶层的共同富裕，这在历史上、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先例。欲速则不达，我们既不能消极等待，也不能过分急切，必须循序渐进、稳扎稳打，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共同富裕是一个造福于民的过程，要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让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生活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更高要求，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也有了更多期待。切好分好“蛋糕”，坚决杜绝一些西方国家长期存在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现象，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是重大责任和重要任务。深入落实“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要求，顺应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需求和发展趋势，形成市场有效、政府有为、人民幸福的良好局面。

市场通过竞争、价格、供求的相互作用，灵活高效调节资源的投放方向和数量，从而达到对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在市场经济中，市场主导的生产活动和产业分化是提高社会整体财富水平、拓展居民收入来源的基础，市场作用决定了收入分配的结构性特征。在初

次分配环节，以发挥市场功能为主，结合政策调控，统筹效率与公平，让劳动和各种要素得到相应的报酬，为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物质基础。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要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工作。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市场更具支配优势的方面，降低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成本，为市场合理高效运行释放更多空间。对于市场中存在的无序竞争等现象，必须履行好政府职能，依法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矫正要素配置失衡现象，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在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环节，突出政府的关键作用，补齐短板。再分配要完善调节机制，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做好低收入人群的保障，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调节。切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确和完善标准，推动居民就近就地享有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更加聚焦群众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兜住民生底线；完善企利企政策，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积极拓宽就业创业渠道；用好税收优惠政策，使其在收入调节中更好发挥作用。三次分配中，建立健全鼓励引导机制，激发企业和社会群体的慈善捐赠意愿，在社会形成倡导公益事业的良好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大历史观。这既包括增强历史主动的自觉，也包括保持历史耐心的清醒。我国已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为实现共同富裕打下了良好基础。但面对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寻找多重约束条件下的破题之策。驾驭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特别是发挥好投资的关键作用，注重投资效用和效率，充分鼓励激发民营资本和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稳定发展预期，全力把蛋糕继续做大的同时兼顾公平正义并做好再分配，奋力推进共同富裕不断取得新成效。

（作者系北京市西城区委副书记、区长）



以四个“统筹”发挥资本积极作用

□ 马相东 黄晓宇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国内和国际，注重激发包括非公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本活力，发挥其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的积极作用”。这为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存在的各类资本及其作用提供了根本遵循，为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统筹发展和安全。发展和安全是一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历史经验表明，只有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才能既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又从容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步入新发展阶段，我们既要把握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激发各类资本的活力；又要增强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防范各类资本风险。一方面，继续推动资本市场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让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突出自身特色、找准自身定位，为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资本提供平台，激发各类资本的活力。另一方面，深刻认识到资本的逐利性，在不断完善和发展资本

市场的同时，防范、化解因资本“以利逐利”、无序扩张而引致的系统性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和资源能源风险。不仅如此，还要警惕由此带来的经济问题

和政治问题的交织风险，既要守住存量风险，更要预判增量风险，提早“拆弹”，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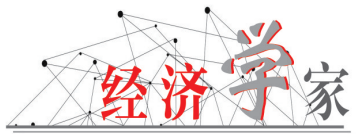
统筹效率和公平。资本会源源不断地流向要素回报率较高的行业，这是资本逐利本性使然，也是市场配置资本高效率的体现。然而，如果对资本不加约束，它就有可能流向某些市场条件还不成熟的行业，导致垄断红利压倒创新红利。由此形成的资本巨头，不仅会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损害市场竞争的公平性，还会阻碍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因此，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让资本健康发展。一方面，为资本开“绿灯”。在坚持让市场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同时，政府要积极作为，引导资本扩大对于科技创新的有效供给，使资本流向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关键环节。依靠科技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促进资本周转效率，也能够增强创新这个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科技创新支撑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对垄断资本设置“红灯”。这就要求政府强化“反垄

断”，并深入贯彻落实公平竞争政策，为资本提供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使不同形态的资本机会平等、公平竞争。

统筹活力和秩序。我国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进一步激发资本的活力，发挥资本要素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当前亟需突破的一些“卡脖子”技术，也需要资本的大量投入。与此同时，我国现阶段的资本呈现出规模扩大化、主体多元化、运转加速化等特征，这就要求资本在运转的过程中有序可循、有法可依。因此，如何让各类资本既“百花齐放”、绽放活力，又有序运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统筹活力与秩序，就是让好秩序促进各种资本动起来、活起来、旺起来。对于不同类型的资本，要因势利导，也要处理好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针对国有资本，要稳步推进电网、铁路等自然垄断行业改革，释放其活力，继续发挥“顶梁柱”的作用。针对在吸收就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民营资本，政府要继续发挥其政策上的支持作用。诸如一系列的减税降费政策，不仅是在为民营资本解决“融资贵、融资难”的问题，实质上也是在激发其活力，为政府“涵养税源”。

统筹国内和国际。改革开放40多年

以来，尽管我国经济发展极大受益于货物贸易，但同时也意识到，长期来看，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将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独立自主性。因此，要逐渐降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尤其是，对于芯片、高端材料、精密仪器等一系列的高精尖技术，要加大国内的投资研发，让国有资本发挥“领头羊”作用，打造原创技术“发源地”，减少对进口的依赖程度。从国际形势看，在百年变局、世纪疫情、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我国要继续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就必须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对资本要素而言，要让它在区域之间畅通流动，打破地方保护、建立统一规则，推动各类资本跳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加入全国统一大市场。除此之外，也要充分将国外资本为我国所用，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制度，建立起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匹配的外资安全保障制度。



王 东京

美国经济学家费雪1930年出版的《利息理论》，开篇说“收入是一连串事件”。我动笔写这篇文章忽然想到了费雪，于是改两个字，就用这句话做题目。创新确实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过我不打算对具体的创新过程作分析，而重点讨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的关系。

众所周知，基础研究的目的是发现规律（定律或定理），而且我们还知道，规律只能利用，不能创新，更不能人为地创造。比如“圆周率”，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最初计算出圆周率近似于3.14，而中国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将其精确到了小数点后7位。可无论圆周率如何精确，皆属于发现而不是发明，因为即便今天科学家没有发现它，圆周率也客观存在。

与基础研究不同，科技创新则属于发明。顾名思义，发明是指以前没有的技术（产品），而现在创造出来了。比如第一次技术革命，发明了蒸汽机；第二次技术革命，发明了电；第三次技术革命，发明了互联网。这三项技术（产品）皆是从无到有，假若没有人发明，就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发明属于创新。

于是问题也就来了，基础研究既然是发现（规律）而不属于创新，中央为何要强调重视基础研究呢？或者问：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到底是何关系？简单地回答，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基石。就好比一棵果树，基础研究是树的根系，科技创新是树上结的果子。一棵果树要是没有根系，当然不可能结出果子来。

举大家熟悉的例子。200多年前，人们造船皆是采用木材，可到19世纪初蒸汽动力船出现后，英国企业家威尔森试图用钢铁代替木材造船。当时很多人认为，钢铁的密度大于水的密度，让钢铁漂浮在水上无异于异想天开，是发神经。可威尔森却自信满满，经过反复试验，最后成功地造出了人类第一艘铁壳船。

威尔森何来这种自信？其实，他的自信来自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该定律说，物体沉入液体中所受到的浮力，等于它排开液体的重量。也就是说，只要让船在水中受到的浮力足够大，它就能在水上漂浮。威尔森正是懂得了这个原理，所以坚信只要设计好船体的形状，就不会因为钢的密度大于水的密度而下沉。

再一个例子，是美国莱特兄弟造飞机。莱特兄弟从小就有造飞机的梦想，可在当时很多人看来，要让比空气重的物体在空气中飞行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1896年，他俩开始在基蒂霍克沙丘上空进行载人滑翔机试验，经过无数次失败后，终于梦想变成了现实。1903年12月17日，他们制造的第一架“飞行者1号”，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试飞成功。

莱特兄弟之所以屡败屡试，其底气也是两个定理：一是“流体连续性定理”。即流体通过粗细不同的管道，同一时间内流体质量相等而流速会不同。以水为例，当河道较宽时，流速会较慢，河道较窄时，流速则会较快；另一个是“伯努利定理”，即空气的流速与压强成反比。根据上面两个定理，如果让飞机机翼的上部呈凸面形，底部呈平面形，上部空气流速快，压强相对小；底部空气流速慢，压强相对大，这样当飞机滑行达到一定速度就能飞起来。

我举上面的例子，无非是想证明这样一个结论，创新是一连串事件，而源头是基础研究。或说基础研究是创新的“最先一公里”。想想也是，假若没有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也许至今没人会想到用钢铁造船；若没有“伯努利定理”，恐怕也不会有人造飞机。放眼世界，迄今还没有一个基础研究落后的国家而成

创新是一连串事件

为科技强国。不是吗？我赌读者举不出一个例子来。

由此见，推动科技创新，关键在于强化基础研究。其实这道理说起来大家都懂，问题是怎样才能让学者专注于基础研究。我们知道，基础研究的成果是定理或定律。一旦公之于世，其使用便不排他。比如前面提到的阿基米德“浮力定律”，威尔森可用它造铁壳船，别人也可用它造水上公园。若用经济学的专业术语说，基础研究成果是典型的“公共品”。

是的，困难就在这里，创新性技术可以通过申请“专利”有偿转让，创新性产品也可通过市场出售取得收益。可由于定理或定律的使用不排他，无法向使用者收费；而且由于它们没有直接的商品载体，也无法在市场上出售获利。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我从未听说过哪家飞机制造公司花钱购买过“伯努利定理”，也没听说过哪家造船公司使用“浮力定律”支付过费用，读者也应该没听说过吧？

从这个角度，也就解释了目前国内学者对基础研究为何热情不高的现象。学者当然要有情怀，但他们同时对物质生活待遇也会有追求。也正因为如此，中央提出财政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政府财政本来就是公共财政，而且我在前面分析过，基础研究成果为科技创新提供理论支撑，属于公共品（服务），所以用财政资金资助基础研究，既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也是公共财政应承担的重要职能。

现在需要研究的是，在一定时期，政府财力总是有限的，仅就科技创新来说，希望得到财政资助的项目也很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若不分轻重缓急，僧多粥少，财政资金只能天女散花。实践证明，财政资金过于分散，对推动创新的成果并不理想。而要集中力量办大事，财政就应该收缩战线，重点资助基础研究、杀手锏技术与颠覆性技术创新，将民用技术创新推向市场融资。

具体到政策操作层面，我最后想提三点建议：第一，由于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不能通过市场取得收入回报，政府要为他们提供相对优越的研究条件与生活待遇，让他们体面地做学问；第二，根据基础研究的特点，财政前期投入不必过大，应主要用于“智力报偿”，对取得重大成果的学者给予重奖；第三，对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不能急于求成，也不必搞所谓年度量化考核（如论文数量等），对暂未取得成果的学者，要有足够的宽容和耐心。